

53年前中国挺过了比非典、新冠更残酷的疫情

作者：刘远举 中产财经生活

前言：春节期间，我看到一段关于疫情的视频，非常震惊，历史不该被遗忘，我们要吸取教训。同时，我觉得，视频中的历史，也可以在当下给大家带来一些信心。

这段视频，是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，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视频。在这段视频中，曾光说，1967年，中国发生了一场300万人感染、16万人死亡的疫情。

虽然曾光说得很平淡，但300万人感染、16万人死亡，非常令人震惊。更令人诧异的是，就发生在50多年前，居然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。我举个例子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，几乎人人都知道，其死亡人数是24万人，和这场瘟疫是一个量级的。而且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，也就是流脑，易感者主要是小孩子、青少年。不难想见，当年多少家庭痛失孩子，但是，它就这样，居然就这样，消失在国人的记忆中。如果不是如今的新冠病毒肺炎，我还不知道1967年有如此大的疫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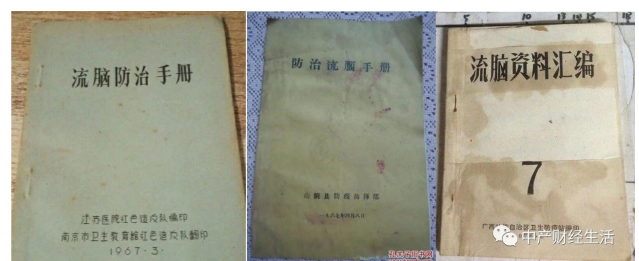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，这个巨大的数字，在今天也没引起任何反响，16万人仅仅是一个数字。我觉得它不该被遗忘，所以我去搜索了一番，史海钩沉，惊心动魄。

1896年发现流脑病毒后，中国曾经历过三次大暴发，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、1967年和1976年。曾光所说的就是1967年这一次。

1967年，53年前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太久远的事。更远的历史事件，比如抗战、解放战争、二战、各种运动，网上史料很多。但我搜索了一下，关于这一次大的疫情，资料并不多。

关于1967年流脑病毒的记载

《安徽日报》2017年04月28日的一篇文章，有这样的内容：“以流脑为例，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，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。而2016年，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。”



不过，雁过留痕，历史还是有依稀的痕迹。痕迹在孔夫子旧书网。孔夫子旧书网中，那个年代关于流脑的书，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。

另一个痕迹在一些地方的地方志中。如今读来，平



静的文字与抽象的数字下面，还是感受到无数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。我摘录一些，大家可以看看。

南京：在南京解放前有史料记载发病流行12次，民国3年（1914）、民国22年至民国36年（1933~1947）、民国34年（1945）至1949年，共发病232人。南京解放后，1967年，为流行高峰年，全市发病13837人，死亡303人，年发病率464.59/10万。——南京地方志

青岛：建国后，市传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脑病人。1964年和1967年两次发生流脑流行，发病率分别为169.50/10万和390.17/10万，（青岛当时人口约140万，也就是说，大约5400人感染）病情凶险，重病以休克型为多。——青岛市情网

辽宁：1967年3月，辽宁地区出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，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。发病率高达177.97/10万，病死率为5.80%。

为控制该病流行，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，各市县也相继成立防病指挥机构。1967年共发病51931人，死亡3013人。——辽宁省地方志网站

绍兴：1950年，绍兴地区发病（流行性脑脊髓膜炎），68例，死亡15例。1951年，发病220例，死亡率23例。1957年，部分乡村出现局部暴发流行，共发病1620例，死亡161例。

1966至1967年，由于人群大流动，本病在城乡各地暴发流行。1967年尤为严重，共发病29118例，死亡1040例。1969年，发病率显著下降。——浙江绍兴市志

这些地方志中所说的“人群大流动”，一些资料中也有提到，比如，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”网站，知识天地栏目有这样的内容：1966~1967年在中国出现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动，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大流行，发病率为403/10万，死亡16万多人。—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



1966年，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22位革命小将越过千山万水，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。

大串联带来的巨大人口流动

人群大流动，空前大流动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

海南文昌：1967年，发生流脑流行，全县21个公社（镇）和3个国营农场共发病643例，死亡57例，死亡率8.86%。时值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人群流动量大，发病面广，蔓延快，救治药物奇缺，死亡率较高。——海南史志网，文昌县志

上海川沙：建国初期，“流脑”发病率高，疫情起伏大。“文革”初期，受大串联影响，引起暴发流行。1966年发病2015例，1967年上升至4916例，发病率868/10万。——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二十八卷

这个记载，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联。串联并不遥远，亲历者现在六、七十岁。那么，人口大流动，红卫兵串联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？

1966年，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。9月5日的《通知》发表后，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。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，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很特殊的一道风景。

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，共1100~1300万人，这个数据源于王令金著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

规律》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书。

想象一下，绿皮车厢中挤满了一车的红卫兵，大家都不知道流脑，也没防护，昏昏沉沉坐车，一起待上十几个小时。这就是曾光所说的，火星带到全国各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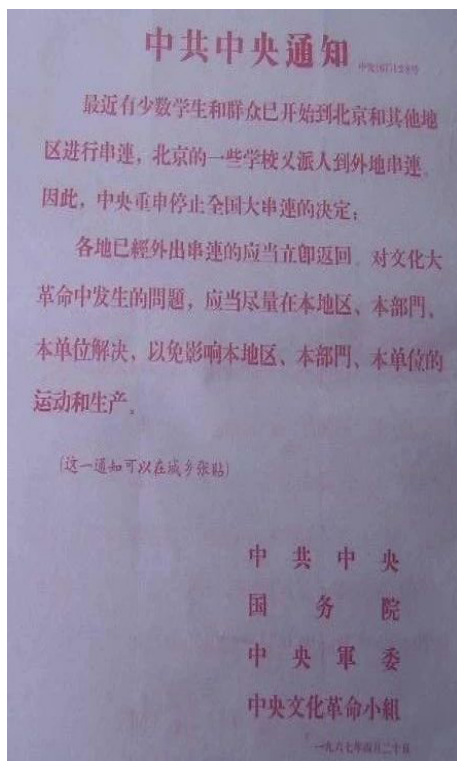
春运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？2015年，春运有37亿人次，当然，这是坐车算一次，坐火车又算一次，公交再算一次。至于武汉这次，出城的人数现在很清楚了，500万人。

不过，不必恐慌，直接对比流动人口规模并不科学，因为1967年的中国，不仅物质贫乏，缺医少药，人民防疫意识低下，更糟糕的是，防疫体系也是混乱的。由社科基金赞助的一项研究，揭示了当时的局面：
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暴发四次全国性的“流脑”流行，其中1966~1967年的“流脑”疫情是最严重的一次。

红卫兵“大串联”导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，对社会单位结构的“打倒”，导致防疫体系的破坏，以及其带来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四方面问题，是这次“流脑”疫情暴发的直接诱因。

为抑制疫情，中央及地方党政机构紧急叫停红卫兵“大串联”，并组织领导机构积极开展防治工作，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了“流脑”疫情。——《1966~1967年



▲在跨洋铁路修成后的庆功宴上，没有一个华人的身影。（网路图）

全国性“流脑”的暴发与防治》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建国以来党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”（项目号：2011BDJ018）

大串联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，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，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。1966年11月16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又发出通知，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，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。并说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联，先进行试点，取得经验，为来年徒步大串联作好准备。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，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联，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；12月21日起，不再实行免费。

1967年2月3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，要求外出步行串联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，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联。同年3月19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》，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，4月20日，再次重申停止串联。在其后的一些运动中，也规定不准串联。大串联便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名词。这一连串的通知不难推知，放出笼的学生游兴大发，不愿意回去。80后可以去问问父辈，他们免费旅游的青春。

串联与流脑的关系，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痕迹：

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脑爆发，大串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。而卫生部因“文化大革命”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。1967年3月7日，周恩来就此问题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批示说：“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，……马上开始工作。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，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扰他们。”——（《毛泽东、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》，《党的文献》2003年第5期。）

3月24日，周恩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开会，询问防疫情况，说抓流脑、抓防疫“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，一天都不能迟缓。”——《周恩来年谱（1949-1976）》

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示下，各地采取相应防治措施，疫情严重的地区还成立了防治流脑的机构，1968年后各地疫情逐步下降。——《周恩来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细菌战》，人民网-中国新闻网

两份文献对比，不难发现，1967年3月7日，周恩来就下过关于流脑的批示，3月19日北京又发布了停止串联的通知。不难推断，当年停止串联，特别是在1967年停止了原本的徒步串联，肯定有流脑疫情严重的原因。而且，这个顾虑，还影响到了后来的运动模式。

（下接第B2版→）